

姜辉. 美国出口管制下中国外贸风险的省域地理差异 [J]. 地理科学, 2020, 40(10): 1618-1626. [Jiang Hui. Chinese provincial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 trade risks arisen from U.S.A export control.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0): 1618-1626.] doi: 10.13249/j.cnki.sgs.2020.10.005

美国出口管制下中国外贸风险的省域地理差异

姜辉

(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从总贸易、出口、进口、外资和人员 5 个视角构建对美风险系数, 测度和比较各省区市对美外贸风险的地理差异。结果表明: 上海、浙江和福建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最大,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 面临的综合外贸风险最大; 河南尤其需要防范对美国的出口风险; 海南、新疆、天津和西藏等需要加强从美国进口的风险管理; 重庆除了需要防范对美出口风险外, 还因为实际利用美资最多且依赖程度最大, 亟需加强外资风险管理。宁夏和山西虽然从美国的引资规模不大, 但是对美资的依赖程度最高, 亟需提升外资多元化水平。从人员跨境流动风险来看, 上海、北京和浙江面临的风险最大。中国各省区市在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时应该加强外贸风险的识别和管理, 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差别化的防范和化解措施。

关键词: 出口管制; 外贸风险; 市场依存度; 省域地理差异; 美国

中图分类号: F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0)10-1618-09

外贸风险是指某些因素的非预期改变给贸易主体带来额外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 包括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 前者是由国家风险、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等组成的系统风险, 后者是包括企业战略风险和运营风险等在内的非系统性风险。外贸风险的构成复杂多样, 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期和复杂性等特征。毕玉江指出中国外贸风险主要包括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贸易摩擦、贸易条件恶化、多国政策博弈不确定性和国际分工锁定等^[1]; 出口风险表现为世界需求下降、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汇率波动等; 进口风险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市场集中度和依赖度过高等^[1], 梁琦等认为国际市场汇率的波动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2]。当前, 扩大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3], 防范外贸风险具有较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进出口第一大国, 面临的外贸风险与日俱增: 一方面, 在美国对华实施歧视性出口管制背景下, 外贸风险成为阻碍中国外贸健康发展的绊脚石。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分别经历

了冷战期、转变期和经贸合作期^[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愈演愈烈。2018 年 8 月美国将中国 44 家企业列入商务部《出口管理条例》(<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4389>) 实体清单, 11 月又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传感等 14 类核心敏感技术列入出口管制框架。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上半年美国屡次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另一方面, 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在广度、价格和数量上均持续增长^[5], 但是中国对美国市场仍然存在严重依赖。从出口市场来看,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额占中国总货物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18.99% 和 19.29%^[5]。刘卫东等研究发现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各省区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6]。从进口市场来看,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自美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中国总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8.35% 和 7.25%^[6]。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远高于对其产品的进口依赖。由于各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差异是拉大产业结构差异的重要因素之

收稿日期: 2019-10-04; **修订日期:** 2019-1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J029)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BGJ029).]

作者简介: 姜辉(1979-), 男, 土家族, 湖北鹤峰人,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政府管制和技术创新研究。E-mail: jianghui@cjlu.edu.cn

一, 所以, 各省区市的经济转型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7]。未来, 中国传统产品对美出口的阻力将急剧上升, 从美国引进高新技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外贸风险将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外贸风险的形成和积聚。Braga 和 Marcus 认为政治因素是上市公司股权交易风险的主要来源^[8]。Aftab 和 Rehman 认为汇率波动会冲击双边贸易^[9]。曾孟夏等认为竞争越激烈外贸风险越大^[10]。何有良指出贸易壁垒越多外贸风险越大, 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的生存风险明显高于加工贸易企业^[11]。刘汉认为外贸开放度越高, 经济下行风险就越小^[12], 但薛蕊认为贸易开放增强了经济波动性, 从而加剧出口风险^[13]。林常青指出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在“初裁定阶段”和“终裁定阶段”对中国出口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前者显著高于后者^[14]。其他造成外贸风险因素还包括气候变化、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15]。

加强外贸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是化解外贸风险的重要措施。Berry 发现加强企业风险管理能够显著降低资本成本^[16], Niepmann 主张通过投保的方法转移外贸风险^[17], 王静等认为加强外贸风险管理的前提就是要有效地识别风险^[18]。李笑影等认为外贸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降低该风险就需要建立“经侦投诉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19], 王帅认为需要从全球治理视角规避外贸风险^[20]。毕吉耀等从贸易救济、投资、旅游和人文交流等视角提出规避对美外贸风险的建议^[21], 张军生等从构筑共赢性经贸关系等方面提出外贸风险的规避对策^[22]。此外, 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网络对华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23]、寻求多元化的地缘经济空间^[24]、改善贸易结构等都有利于降低外贸风险。Lofstedt 和 Schlag 发现当管理者着手处理一种风险时, 往往又会形成另外一种未曾预料的风险^[25]。中国在加强外贸风险管理时既要对其已有风险进行规避, 又要对潜在风险进行预防。

综上所述, 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贸风险的分类、成因和应对措施等领域。当前, 中国各省区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存在差异, 有的省份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出口依赖, 有的省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较严重。哪些省区市面临更大的外贸风险? 面临不同外贸风险的省区市应选择怎样的进出口贸易促进策略和风险应对措施? 研究上

述问题, 有助于各省区市正确地认识对外贸易中的风险的地理差异, 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性外贸政策, 提升外贸风险应对水平, 寻求针对美国出口管制的有效反制措施,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1 理论探讨与机制梳理

制度风险是外贸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制度的不确定性和歧视性会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美国出口管制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提高外贸的交易成本、冲击原有的交易模式, 迫使中国企业寻求美国以外的替代产品 and 市场。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外贸造成的风险包括直接风险和间接风险。

1.1 直接风险

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外贸产生的直接风险包括技术引进风险、技术贸易风险和企业合规风险。技术引进风险是指由于美国出口管制, 中国从美国及其它地区引进高新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和不确定性增加。技术贸易风险是指由于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致使技术贸易下降和萎缩。出口管制政策降低两国的技术贸易规模, 限制技术的跨国合作空间。企业合规风险是指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 致使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和技术合作时面临美国商务部制裁和处罚的风险。例如, “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就是因为所谓“合规问题”而给企业造成的经营风险。

1.2 间接风险

间接风险是指由于美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而产生的连锁效应或副作用, 具体包括与第三国的合作风险、相关产品的贸易损失风险和中国输美产品受阻的风险。与第三国合作风险是指由于担心触犯美国出口管制的相关法规, 国外的企业会减少与中国企业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接触与合作, 从而致使中国企业失去许多潜在的国际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机会。相关产品的贸易损失风险是指美国对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其相关的非高技术类产品、技术和服务贸易下降。中国输美产品受阻风险是指由于美国出口管制抑制了对华出口的增长, 从而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 为了平衡贸易, 美国开始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极大地阻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管制强度与外贸风险存在正向关系, 即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强度越大, 则中国的外贸风险就越大。美国出口管制作为中国外贸风险的重要

外生变量,虽然难以避免,但是也可以通过优化中国外贸结构和加强对美反制措施得以规避和减缓。正确认识出口管制与外贸风险的内在关联是降低中国当前外贸风险的前提条件。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研究在美国出口管制背景下各省区市面临的外贸风险。由于不同省份在统计经贸数据时采用的货币存在差别,所以,为了数据的可比性,统一按照 2017 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 6.78 转化为“亿美元”,但是澳门则仍然以“亿澳门元”为单位。如果某省区市数据缺失,则在统计分析时不予考虑该省区市。例如,《四川统计年鉴》没有分国别的贸易数据,湖北、贵州等地没有分国别的引进外资数据。

本文采用横向对比的研究方法,比较不同省区市面临的相对风险差异,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值,如果某省区市的指标值远远高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意味着面临的风险也远高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测度各种风险时,利用指标分析法,借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结构和外资结构等指标度量外贸风险。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外贸风险区分为总外贸风险和单项外贸风险,前者反映各省区市面临的总外贸萎缩或损失的可能性,后者度量各省区市对美国的出口、进口、外资和人员流动等单项损失的可能性。

2.1 总外贸风险

当美国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时,各省区市的进出口贸易均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用如下公式度量总外贸风险(RFT, Risk of Foreign Trade):

$$RFT = (IM_{USA} + EX_{USA}) / (TIM_{WORLD} + TEX_{WORLD}) \quad (1)$$

式中, IM_{USA} 、 EX_{USA} 分别表示各省区市从美国的进口额和对美国的出口额; TIM_{WORLD} 、 TEX_{WORLD} 分别表示各省区市从世界的总进口额和对世界的总出口额。该值越大表明该省区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大,面临的总外贸风险就越大。

2.2 对美国的出口风险

各省区市对美出口风险主要源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用如下公式度量对美出口风险(REX, Risk of Export):

$$REX = EX_{USA} / TEX_{WORLD} \quad (2)$$

REX 值越大表明各省区市的出口企业对美国

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越强,从而面临的风险就越高。

2.3 从美国的进口风险

各省区市从美国的进口风险主要源于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以及中国为应对美国对华关税政策而采取的相应报复性关税措施,既包括进口规模下降,又包括进口成本上升。用如下公式度量对美进口风险(RIM, Risk of Import):

$$RIM = IM_{USA} / TIM_{WORLD} \quad (3)$$

RIM 越大表明各省区市的进口企业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程度越高。在面临美国出口管制时,国内进口企业选择的余地就越小,很难分散和化解出口管制形成的政策风险。

2.4 引进美资的风险

各省区市吸引外资的水平受到中美 2 国经贸关系制约。经贸关系缓和时,吸引美国资本的规模上升,反之则下降。用如下公式度量对美外资风险(RFDI, Ris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FDI = FDI_{USA} / FDI_{WORLD} \quad (4)$$

式中, FDI_{USA} 和 FDI_{WORLD} 分别表示各省区市吸引美国的投资额和吸引世界的投资额。该值越大表明该省区市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在美国出口管制背景下面临的外资风险就越大。

2.5 人员流动受阻风险

出口管制升级背景下,美国不仅限制产品的流动,还通过签证等手段限制特定敏感技术人员的流动。当前,美国对出入境的人员限制包括敏感行业的科研技术人员、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特定的媒体工作者等。对科技和经贸人员的签证限制直接导致外贸的交易成本上升和风险加剧。由于美国出口管制既影响出境人员,也影响到入境人员,所以,综合考虑“出境”和“入境”2 种情形有利于更全面地度量人员风险。鉴于中国各省区市出境到美国的人员数据无法获得,本文仅选取入境到中国的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数据,用如下公式度量人员风险(RPE, Risk of Personnel)。

$$RPE = PRN_{USA} / PRN_{WORLD} \quad (5)$$

式中, PRN_{USA} 和 PRN_{WORLD} 分别表示各省区市吸引美国的入境人员数和吸引外国人的总入境人员数。该值越大表明各省区市与美方人员接触的需求就越大,一旦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升级,则人员流动难度剧增,容易遭受技术合作纽带割裂和人员交流

渠道受阻风险。中国外贸企业在对美贸易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出入境美国时的人员风险。

3 结果分析

研究进出口贸易时, 本文选取除四川以外的 33 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外资风险时, 选取除四川、湖北等以外的 26 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研究人员风险时, 选取除山西、河南等以外的 26 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来自各省区市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gz/wzlj/dftjwz/>)、经济社会发展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26]。

3.1 总外贸风险

中国各省区市对美国总外贸风险可从绝对贸易规模和相对依赖程度 2 个层面度量。如果某省区市与美国进出口贸易规模越大, 则遭受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潜在风险就越大。此外, 从相对依赖程度看, 即使某省区市与美国的贸易规模不大, 但是对美国产品或市场存在高度依赖, 则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该省区市的潜在冲击就越强。

2017 年中国与美国总外贸规模 5 836.76 亿美元。中国各省区市在对美贸易规模上差别较大, 与美国贸易规模最大的前 8 个省区市及贸易额依次是广东 1 273.38 亿美元、上海 770.10 亿美元、香港 702.04 亿美元、台湾 671.80 亿美元、浙江 618.87 亿美元、山东 339.88 亿美元、北京 315.48 亿美元和福建 283.21 亿美元。上述省区市大部分处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总外贸依存度为 14.21%。为了度量各省区市的相对外贸依存风险, 本文选取各个样本的总外贸风险系数 RFT_i 对总样本均值 $\sum_i RFT_i$ 的偏离程度来度量风险大小。由于外贸

依存度越大, 意味着相对风险就越大, 所以 ΔRFT_i 正向偏离均值越大则外贸依存风险越高, 反向偏离均值越远则外贸依存风险越小。

$$\Delta RFT_i = RFT_i - \frac{\sum_i RFT_i}{i} \quad (6)$$

式中, ΔRFT_i 度量了某个省区市的相对外贸风险。本文侧重比较不同省区市面临的外贸风险差异, 在划分风险等级时, 按照风险系数值将排位靠前、较靠前、居中、靠后以及最后等 5 种情形对各省区市进行分组, 将 $\Delta RFT_i > 4.5$ 界定为高风险、4.5~1.5 为较高风险、1.5~0 为中等风险、0~-5.5 为较低风险、<-5.5 以下界定为低风险, 利用公式(6)测得中国各省区市的相对外贸风险(图 1)。

2017 年中国各省区市对美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为 11.62%。对美外贸依存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海南、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和天津等, 中西部地区的河南、重庆和青海等。台湾省对美国的相对贸易风险值仅为 0.03, 图 1 中的风险柱形图非常接近横坐标轴。上海、浙江和福建等 3 省市不仅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大, 而且还对美国市场存在较高的依赖程度, 由此承担比其他各省区市更大的外贸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下降、总体外贸规模萎缩、贸易对 GDP 的拉动力减弱, 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等。为更好地评估各省区市面临的出口管制政策的冲击, 接下来需要测度单项风险。

3.2 出口风险

出口风险主要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或抬高贸易壁垒等而产生。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新疆和西藏的出口数据分别为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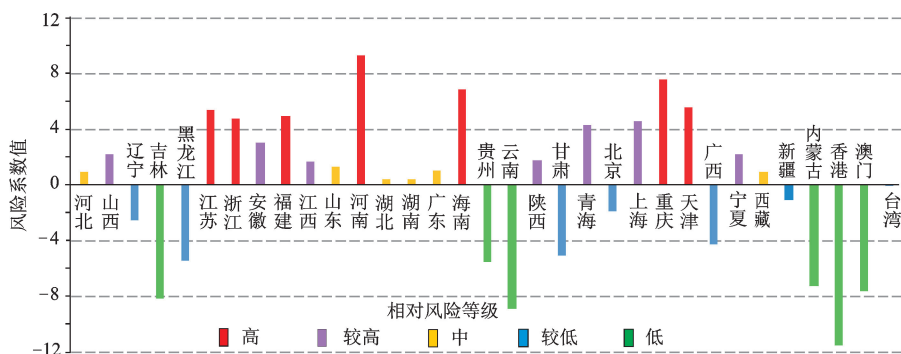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中国各省区市的相对外贸风险

Fig.1 Comparative foreign trade risks of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7

年和 2016 年,其他各省区市均为 2017 年。基于前文构建的出口风险度量公式,将出口风险按照不同的依赖程度划分为高、较高、中、一般和低等 5 级,参照公式(2)将风险系数大于 0.19 界定为高风险,0.16~0.19 界定为较高风险,0.12~0.16 界定为中等风险,0.08~0.12 界定为一般风险,低于 0.08 界定为低风险。按照上述标准得到中国各省区市对美国的出口风险等级分布图(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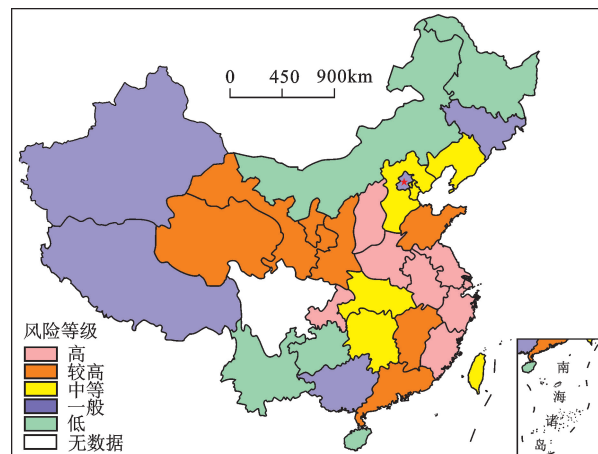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各省区市对美国的出口风险等级

Fig.2 Export risk classification to U.S.A market of provinces in China

在中国各省区市中,河南出口风险最高,2017 年对美国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比重高达 0.32,远高于中国各省区市同期平均水平 0.19。河南出口企业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在美国加强对华管制背景下将面临巨大挑战。重庆面临的出口风险仅次于河南,其对美出口风险系数值为 0.27。其他几个面临高出口风险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省市名称及风险值依次为江苏 0.24、上海 0.24、福建 0.20、浙江 0.19 和安徽 0.19。需要特别关注山西省,该省 2017 年出口风险系数值高达 0.22,但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和关税政策的影响较小,2019 年上半年其对美国出口额成倍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山西大量出口的手机产品不在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从而受到关税管制政策影响较小。面临对美高出口风险的省区市应该充分认识到出口管制和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潜在危害,随时防范和化解美国政府的政策风险。

从地理分布来看,面临“较高”和“中等”出口风险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面临“一般”和“较低”出口风险的省区市主要分布

在西南、西部和北部地区。不难发现,面临低外贸风险的省区市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不及东南沿海各省,在对外经贸往来上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度,大力拓展在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

3.3 进口风险

进口风险容易出现在严重依赖美国产品或技术的贸易品中,主要包括高技术产品和大宗必需品。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风险源于美国对华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如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的出口禁令直接导致这 2 家高技术企业巨头面临重要部件短缺的风险。中国针对美国出口管制或进口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也会使部分省份从美国进口产品受阻。如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针对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加征关税,引发征税产品进口价格攀升、进口规模下降以及国内供应减少。

参照公式(3)测算风险系数时,青海和四川自美国的进口额在相关统计年鉴中缺乏数据,新疆和黑龙江为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进口数据,其他各省区市均为 2017 年的进口数据,将进口风险按照所测得的系数值划分为高(0.16 以上)、较高(0.10~0.16)、中等(0.06~0.10)、一般(0.04~0.06)和低(0.04 以下)共 5 个等级,得到中国各省区市自美国的进口风险等级分布(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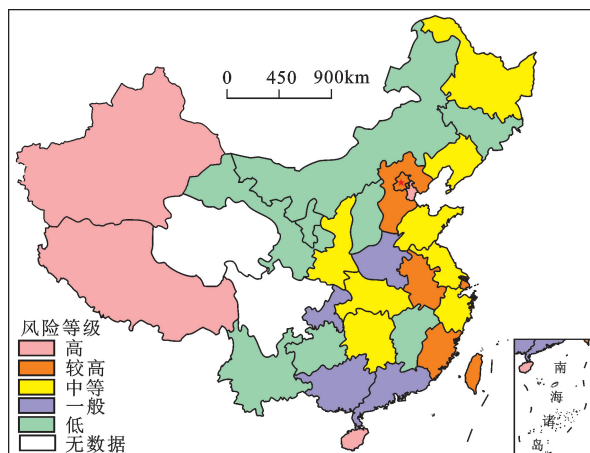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各省区市自美国的进口风险等级

Fig.3 Import risk classification from U.S.A market of provinces in China

海南是中国面临从美国进口风险最大的省份,2017 年其 28% 的进口产品来源于美国市场,对美国产品进口具有高度依赖性。其他几个具有高进口风险的省份依次是新疆(0.20)、天津(0.19)和西

藏(0.16)。西藏和新疆自美国的进口风险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出口风险,也远远高于2017年中国各省区市自美国进口的平均风险值0.08。上述省份应该将进口安全放在首位,确保必要物资和关键设备的顺利进口和及时供应。

从地理区域构成来看,中国西部省份的进口风险高于东部省份,东部省份的进口风险又大于中部省份。中国台湾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2017年约12%的进口品来自于美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对美国的进口依赖较小,进口风险系数值分别为0.05和0.04,面临的进口风险较小。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和东北部的吉林、内蒙古、山西、宁夏和甘肃等省份的进口风险系数值低于0.03,受美国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较小。

3.4 外资风险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会影响到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FDI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受到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美资企业会避免或者减少对华直接投资。如果中国某省区市严重依赖美国的投资,那么,在美国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背景下,该省区市将面临美国投资骤减或撤资的风险。

在研究各省区市的外资风险时,由于吉林、湖北、四川、贵州、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省区统计年鉴缺乏“分国别”的引进外资数据,所以不将上述省份纳入研究样本。从实际利用美资来看,2017年中国引进美资的金额排名靠前的省份依次是重庆9.09亿美元、天津7.63亿美元、山东7.20亿美元、河南6.07亿美元、江苏5.63亿美元和上海5.54亿美元。中国各省区市在利用美资的水平上差距较大。吸引美资较少的省份包括内蒙古43万美元、海南16万美元、新疆5万美元、青海和广西各3万美元。从对美资的依赖程度来看,2017

年中国排名靠前的省份是重庆0.41、宁夏0.24、山西0.12、天津0.07和河北0.06。实际利用美资较少的省份对其依赖性也较小。

在所研究的省区市中,重庆不仅实际利用美资最多,而且对美资的依赖也最大,故而面临最大的外资风险。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和上海等地虽然自美国的引资规模较大,但是对其依赖程度比较适中,对美资的依赖程度都低于8%。宁夏和山西虽然自美国的引资规模只有0.75和2.11亿美元,但是其对美资的依赖程度高达24.08%和12.45%。在美国出口管制背景下,中国对美资具有大规模需求和高依赖程度的省区市面临的外资风险最大,这些省区市应该做好防范和化解美国企业撤资或减资的系列风险。

3.5 人员风险

在研究各省区市面临的人员风险时,由于山西、河南、湖北、贵州、西藏和港澳台等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仅选取中国其他的26个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2017年中国接待入境美国人最多的几个省区市依次是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和陕西。美国人在入境的总外国人比率最高的省区市依次是北京、四川、上海、青海和浙江(表1)。

吸引美国人入境的主要因素包括旅游和商贸。从商贸的角度来看,入境的美国人数量与对美贸易规模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两国人员交流越频繁,则潜在的贸易机会就越多。两国经贸交流越频繁,则企业间的人员交流和互访频次就越大。当人员流动受到出口管制等政策的影响时,人员交流就下降,尤其是当高新产业或敏感产业的相关经贸人员往来受到限制时,该类产业的经贸合作和外贸规模就会急剧下降。可见,当出口管制政策影响到经贸人员的出入境时,上海、北京和浙江将面临比其他各省区市更大的人员风险。

表1 2017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员风险

Table 1 Personnel risk of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7

省份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湖南	广东	海南
AN	5.72	6.34	2.58	0.65	24.91	63.65	28.84	31.53	4.92	22.17	8.03	80.41	2.91
AP	0.036	0.023	0.020	0.007	0.067	0.115	0.090	0.108	0.086	0.063	0.052	0.093	0.026
省份	四川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北京	上海	重庆	天津	广西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AN	37.97	22.15	40.15	0.33	0.77	67.3	95.88	22.97	5.84	13.52	0.33	0.8	0.6
AP	0.157	0.044	0.105	0.042	0.136	0.171	0.143	0.106	0.085	0.053	0.098	0.005	0.003

注:AN为某省接待入境的美国人数量(万人);AP为某省接待入境的美国人占总入境的外国人的比率;不含山西、河南、湖北、贵州、西藏和港澳台等数据。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美国出口管制增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风险,极大地阻碍各省区市利用外贸和外资等推动经济增长政策的落实。在开放型市场中,经济上对进出口贸易具有高依存度的省区市比其他省区市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出口管制背景下,外贸上对美国市场具有高度依赖的省区市所面临的风险又显著高于其他省区市。

前文研究发现,中国各省区市面临的外贸风险在空间地理上具有不均衡性和差异性:从总外贸风险来看,外贸大省面临的出口管制风险普遍高于外贸小省,东部沿海的省区市高于西部的省区市;从出口风险来看,中国东、中部地区省区市面临的出口风险明显高于西部、西南和北部地区的省区市,呈现“东部高-中部中-西部和北部低”的风险地理格局;从进口风险来看,中国西部地区省区市面临的进口风险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各省区市,呈现“西部高-东部中-中部低”的风险地理格局;从外资风险来看,重庆不仅对美资具有大规模的需求,还存在严重的依赖性,由此形成的外资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各省区市,利用美资规模较大的其他省区市还包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和上海等;从人员风险来看,上海、北京和浙江是吸引美国人入境最多的省市,一旦美国大规模地限制相关经贸或科技人员流动,则这些省市的企业就会面临美国合作伙伴无法入境,以及国内企业高管或技术人员无法顺利赴美等人员风险。

各省区市在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时,必须准确认识国际竞争形势,充分意识到中美贸易竞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清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的真实目的,全面了解本省区市企业在对美贸易和经济合作中的优势与劣势,识别和评估对美外贸风险,强化涉外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针对不同的外贸风险制定差别化的应对策略。

1) 加强对美国的外贸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识别外贸风险是防范和化解外贸风险的前提条件。美国出口管制给中国各省区市带来的潜在危害包括关键零部件短缺、核心技术无法获得、主要技术人员供不应求、敏感地区或关键产业市场丢失等。各省区市在考虑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时,首先要正确识别出口管制带来的风险类别,如面临的是出口风险、进口风险、外资风险或人员风险等,还是

多种风险的交织并存,然后,按照风险等级进行排序,区分风险管理的优先级,从省域层面制定针对美国出口管制的反制政策及产业扶持措施,强化和完善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针对美国的风险预警体系。

2) 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差别化的应对策略。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不同的省区市造成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产生的风险类型和强度各不相同。所以,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趋严和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各省区市应该结合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贸易依存度较大的省区市应该适度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把握好国内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过程中释放出的市场机遇,积极扩大内需,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转向国内市场。对美出口风险较大的省区市应该尽快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积极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防范和化解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风险。对美进口风险较大的省区市应该尽快降低对美国相关技术和产品的依赖,通过自主研发解决关键设备和敏感技术的短缺问题,或者在第三方市场寻求美国技术或产品的替代品,从而减少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或产品禁售的风险。面临较大外资风险的省区市应该优化吸引外资的结构,从欧洲和亚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引进外资,或者从国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其他省市吸引投资,制定科学的引资政策,尽早防范美国企业撤资或减资带来的外资风险。对美技术或商贸人员依赖较大的省区市应该注重强化海外人才的引进工作,致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吸引世界各国的高新技术人才,吸引更多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落户,鼓励更多的外国人来华创业和经商,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研发资源,占领全球研发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毕玉江.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贸易结构变动与风险因素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10, 26(2): 15-19. [Bi Yujiang.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 risk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10, 26(2): 15-19.]
- [2] 梁琦, 徐原. 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兼论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J]. 管理世界, 2006(1): 48-56. [Liang Qi, Xu Yuan.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on China's import and

- export trade-the reform of RMB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in 2005. *Management World*, 2006(1): 48-56.]
- [3] 陈波舫, 郝寿义, 杨兴宪.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动力机制[J]. *地理学报*, 2004, 59(6): 1068-1075. [Chen Bochong, Hao Shouyi, Yang Xingxia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6): 1068-1075.]
- [4] 沈石, 袁丽华, 叶思菁, 等. 近40年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波动及背景解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7): 1063-1071. [Shen Shi, Yuan Lihua, Ye Sijing et al. The fluctuation and background analysis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7): 1063-1071.]
- [5] 司增绰, 周坤, 仇方道, 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777-1787. [Si Zengchuo, Zhou Kun, Qiu Fangdao et al.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marg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777-1787.]
- [6] 刘卫东, 刘红光, 唐志鹏, 等.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0, 65(4): 407-415. [Liu Weidong, Liu Hongguang, Tang Zhipeng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xport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4): 407-415.]
- [7] 李方一, 刘思佳, 程莹, 等.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17, 37(1): 37-45. [Li Fangyi, Liu Sijia, Cheng Ying et al. Effect of value-added in China's export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 37-45.]
- [8] Braga Alves, Marcus V. Political risk and the equity trading costs of cross-listed firms[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8(69): 232-244.
- [9] Aftab M, Rehman I U. Exchange rate risk and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Singapore[J]. *Studies in Economics & Finance*, 2017, 34(3): 407-426.
- [10] 曾孟夏, 赵彦云. 产业贸易风险监测系统: 基于国际竞争力的设计——以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8): 47-57. [Zeng Mengxia, Zhao Yanyun. Monitoring system of industrial trade risks constructed o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 example study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4(8): 47-57.]
- [11] 何有良. 贸易壁垒会加剧中国出口企业生存风险吗——以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 145-153. [He Youliang. Is trade barrier aggravate the survival risk of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Taking antidumping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8(1): 145-153.]
- [12] 刘汉, 刘金全. 对外贸易开放度、供需政策与经济风险[J]. *国际经贸探索*, 2016, 32(1): 37-49. [Liu Han, Liu Jinquan. Trade openness,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policy and economic risk.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16, 32(1): 37-49.]
- [13] 薛蕊, 苏庆义. 贸易开放、出口风险含量与中国省级产出波动[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34(8): 19-33. [Xue Rui, Su Qingyi. Trade openness, export risk content and China's output volatilit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2018, 34(8): 19-33.]
- [14] 林常青.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对美出口风险率的影响——基于生存分析方法的经验检验[J]. *经济经纬*, 2016, 33(5): 54-59. [Lin Changqing.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America's anti-dumping to China on estimated hazard of China exporting to America—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survival analysis. *Economic Survey*, 2016, 33(5): 54-59.]
- [15] 李伟, 贺灿飞.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J]. *地理科学*, 2017, 37(9): 1289-1299. [Li Wei, He Canfei.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space transfer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9): 1289-1299.]
- [16] Berry-Stölzle, Thomas, Xu Jianre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2018(85): 159-201.
- [17] Niepmann F, Schmidt-Eisenlohr T. International trade, risk and the role of bank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7: 111-126.
- [18] 王静, 王诺. 建立中国外贸风险的管理模型[J]. *经济问题探索*, 2008(2): 66-71. [Wang Jing, Wang Nuo.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risk management model.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08(2): 66-71.]
- [19] 李笑影, 李玲芳. 互联网背景下应对“一带一路”贸易风险的机制设计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2): 97-114. [Li Xiaoying, Li Lingfang. A study on mechanism design for reducing risk in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trades under internet circumstanc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12): 97-114.]
- [20] 王帅.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粮食贸易风险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4): 36-47. [Wang Shuai. Analysis of food trade risk from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8(4): 36-47.]
- [21] 毕吉耀, 张哲人, 李慰. 特朗普时代中美贸易面临的风险及应对[J]. *国际贸易*, 2017(2): 17-20. [Bi Jiyao, Zhang Zheren, Li Wei. The risks and responses of Sino-US trade in the Era of Trump. *Intertrade*, 2017(2): 17-20.]
- [22] 张军生, 李俊. 中美贸易争端的新动向及风险防范策略[J]. *国际贸易*, 2013(10): 10-13. [Zhang Junsheng, Li Jun. New trends of Sino-US trade disputes and risk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tertrade*, 2013(10): 10-13.]
- [23] 司月芳, 王岱, 王丰龙. 对华跨境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 39(2): 259-266. [Si Yuefang, Wang Dai, Wang Fenglong. Geographic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259-266.]
- [24] 孟德友, 马颖忆, 王晗, 等. 中国商品贸易结构不均衡性对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15, 35(10): 1238-1246. [Meng Deyou, Ma Yingyi, Wang Ha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he Imbalance of China's merchandise trade structure on the geo economic patter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0):

1238-1246.]

- [25] Lofstedt R, Schlag A. Risk-risk tradeoffs: What should we do in Europe?[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6(6): 1-21.

- [26]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stics Press, 2018.]

Chinese Provincial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 Trade Risks Arisen from U.S.A Export Control

Jiang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U.S.A has implemented export control on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against China for many years. The ZTE and Huawei incidents indicated that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have to seriously and urgently consider the overseas business risks because of America export control. The tariffs imposed on Chinese products exporting to U.S. market damaged and distorted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ese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increased foreign trade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risk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firm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isks caused by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into direct risks and indirect risks. The former include the risks of technology absorption, technology trade and enterprise's breach-law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U.S. export control policies,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chain effects and side effects caused by export control, which include risks of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loss and reduction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trade loss or decreasing in related products, and the entrance barrier risk of Chinese products to American market. In order to evaluate foreign trade risk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coefficients of overall foreign trade risk, export risk, import risk, investment risk and personnel risk, and selected the 2017 statistical data of 34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 trade risks among Chinese provinces and cities which suf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polici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trade risk, Shanghai, Zhejiang and Fujian not only have a large scale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have a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the U.S. market, thus bear the highest foreign trade risk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ort risk, Henan and Chongqing bear the highest export ris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both provinces are overly dependent on the U.S. market.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 risk, Hainan, Xinjiang, Tianjin and Tibet heavily depended on the import of American products, therefor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identify and prevent the import risks of related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sk of foreign investment, Chongqing not only absorbed the most amount of American capital, but also heavily relied on American capital, so it faces the highest risk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lthough Ningxia and Shanxi got a small scale of invest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eavily relied on American capital. 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nel risk, when export control policies affect the entry and exit of high technology and strategic trade personnel, Shanghai, Beijing and Zhejiang inevitably face greater personnel risk than other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xport contro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business risks and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foreign trade risks arising from the American export control policies, and adopt differentiated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measures to deal with different risks.

Key words: export control; foreign trade risk; market dependence; provincial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U.S.A